

科技革命正在前所未有地顛覆我們的日常生活、思想觀念以至社會結構，影響力無遠弗屆。敝刊歡迎海內外學者惠稿，探討新一輪科技革命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面對中國社會轉型帶來的衝擊和挑戰。

——編者

## 地緣政治視野下的世界秩序重塑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在這四十年間，中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迅速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並在全球化經濟浪潮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與此同時，中國也在積極謀求增加全球治理的話語權，以實現與經濟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地位，但這一地位遲遲未能得到西方大國的承認。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J. Trump)上台後制訂的孤立主義和單邊行動決策，似乎為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提供了契機。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後者已經準備削弱甚至顛覆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

趙穗生的〈中美在戰後世界秩序構建中的博弈與合作〉(《二十一世紀》2018年4月號)一文對此予以回應。文中指出，全球化的自由主義規範和國家主權原則是當下世界秩序的基礎。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積極融入全球化經濟浪潮，同時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使之成為該秩序的利益相關者。中

#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國非但不會顛覆它，反而會予以堅定維護。不同的是，由於經濟地位的上升，中國希望增加在該秩序中的話語權，進而對其進行重塑，例如提倡成立和推動沒有美國參與的區域安全機構、經濟合作組織以及發展規劃，包括上海合作組織、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乃至「一帶一路」計劃等，都充分體現了中國的這一意圖。然而作為一個新興強國，在硬實力和軟實力都相對欠缺的情況下，中國要立刻承擔起全球大管家的角色，仍然存在巨大的困難與挑戰。因此，當下中國只能在與美國合作的過程中增加對世界事務的話語權，進而對世界秩序進行重塑，而不是將其徹底顛覆。

值得注意的是，當下的世界秩序是在冷戰格局下逐步建立起來的，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對該秩序的形成施加了重要影響。儘管後來經歷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但繼承了蘇聯主要政治遺產和作為中國重要鄰邦的俄羅斯，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而言，自然不會對中美這場合作與博弈視而不見。遺憾的是，對於這場合作與博弈中的「俄國元素」，作者幾乎沒有涉及。畢竟談到這種合作

與博弈，不應該也不可能忽視俄羅斯這個大國的存在。

何志明 成都

2018.5.4

## 女性身體：男性權力博弈的場域

伯格(John Berger)在《觀看之道》(*Ways of Seeing*)一書中指出：「裸體(nakedness)是回復自我之道。成為裸像(nude)就是讓別人觀看裸露的身體，卻是不由自主的。裸露的身體要成為裸像，必先被當作一件觀看的物件……裸體是自我的呈現，裸像則成為公開的展品。」因此成為裸像也就意味著一場公開的權力博弈，這也是邵棟於〈民初小說中的「人體模特事件」與視覺政治〉(《二十一世紀》2018年4月號)一文中所揭示的：洋派畫家(以及新派知識人)與舊派保守人物之間爭奪新的專業合法性(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語)。

近代中國女性解放的第一步來源於一個身體動作，即邁開步子走出去(張念：《性別政治與國家》)。也正是在這一連續的身體動作中，女性對於自我身體的意識誕生，由此感受

到主體性的存在。因此，相較於眾多男性文化人充滿臆想且中西摻雜的女性啟蒙與解放話語，女性對於自我身體的感知更加貼切和真實。身體在這裏成為新意義生成和建構的最佳場所（但「人體模特事件」中始於女性身體的爭論卻與女性身體無關，因為其被當成一個供男性權力與意義爭奪的場域）。邵文分析的包天笑與丁玲的小說中，女性對於自我身體的意識便意味着一種新的解放可能的誕生。

這一點更加體現在丁玲筆下的夢珂身上。在此，筆者與邵文觀點稍有出入。夢珂進入社會後對於男性視覺機制的參與，一方面或許是無奈之舉，一方面也可能暗示着作為主體的女性自身的積極參與，以此希望能從中對其進行改造、破壞或重新建構，即新一場的意義合法性的爭奪。但從故事的結局來看，由於新文化人（男性）的新性別視覺機制的產生以及他們對解放話語的掌握，在場域中始終佔據着統治地位，因此女性的反抗最終被男性所掌握的「民族」與「國家」話語所籠罩與抹殺。丁玲最終的選擇，或許便體現了這一點。

處於同一場域中不同位置的文化人在傳統文化、道德與思想的正典（canon）模式分崩離析後開始爭奪資源與話語，建構新的合法性體系以對抗「象徵統治關係的現有結構」，以此達到「改天換地」的目的，同時也由此獲得自己處於場域中的主宰位置及權力。這是清末民初中國知識界眾聲喧嘩下的主要驅動力。發掘了這一主要線索，也就能更好地理解邵文通過「以小說證史」的方法，

從四篇小說與一次事件中企圖發掘出一個更大的主題——近代中國文化變遷模式中的一個主要特徵。而當定位了這一特徵之後，我們也就能發現它本身所具有的優勢與問題直接影響了當代文化場域的建構。

宋杰 南京

2018.4.27

## 文革中的政治不確定

著名社會學家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曾提出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理論：在不確定的政治形勢下，經濟地位對人的態度和行為選擇的影響有可能失效，修正了馬克思的社會經濟地位決定論。李嘉樹、董國強〈從「奪權」到「軍管」：安徽文革運動初探〉（《二十一世紀》2018年4月號）的研究可謂是對魏氏理論的有力證明，也是目前比較有深度的文革研究作品之一。

文章論證了不確定的政治形勢對派系起伏的影響。不僅地方群眾造反運動的發展和升級與中央高層的鼓勵和支持有關，而且群眾造反運動由高潮轉入低谷也與中央高層的態度有關。比如，「紅衛軍」的盲動與中央對造反派的支持直接有關；後來中央多次宣布復員、轉業、退伍軍人不准成立「紅衛軍」或其他名義的單獨組織，致使造反派內部出現分裂，一批老幹部成為新形勢下的「問題人物」；再後來，「紅衛軍」又被列為「革命群眾組織」，逮捕于得水和通緝程明遠被認為是「錯誤的」。

由於政策的模糊，致使「政治正確」標準混亂，為對立雙方

從本派利益出發理解和詮釋中央指示留下巨大空間。中央對安徽問題的干預，不僅沒有消除派性問題，而且在一定意義上成為派性鬥爭及其擴大的根源。例如中央文件沒有指出「一·二六奪權」是假奪權，也沒有指出其大方向是正確的。「八·二七」疏離甚至反對劉秀山、程明遠等人，是因為害怕這些「問題人物」會玷污該派的政治清白；而「紅革會」源於當時的激進輿論導向，將捍衛「問題人物」看做本派革命性的標識。

文章指出「奉命介入地方群眾運動的軍隊從『支左』演化為『支派』，反映了文革理念與實踐的內在衝突」，筆者認為這個論斷有待商榷。因為「文革」理念既不清晰也不確定，當然也就無所謂理念與實踐的內在衝突。更準確地講，高層的態度變化並非取決於清晰的「造反有理」理念，而是形勢是否可控以及是否達到了領導人在特定形勢下的目標：當中央發現愈演愈烈的運動已嚴重違背了發動者的初衷，尤其是危及政權時，就會由承認「奪權」轉為實施「軍管」；而當形勢偏離了發動者的預期，便又令軍隊從「支左」演化為「支派」。所以，中央政策的模糊和文革派系的起伏皆可追溯至領導人對形勢的研判和掌控。

筆者認為，透過各地文革現象揭示其背後的國家治理結構和文化，是未來文革研究走向深入，繼而從根本上反思文革的基礎。

劉培偉 泰安

2018.5.4